

專訪 北大教授 著名評論家

張頤武簡歷

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包括大眾文化與傳媒、文化理論、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和電影。近年來，始終專注對全球化和市場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並對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化作出了豐富而重要的闡述

主要理論專著有《在邊緣處追索》、《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新中國的形象》、《全球化與中國電影的轉型》等；大眾閱讀出版物有《思想的蹤跡》、《一個人的閱讀史》等。2012年出版《全球華語小說大系（十卷本）》

當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花落」中國，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必將迎來一場新的衝擊和洗禮，當莫言在中國本土作家與該獎項108次擦肩後終於奪冠，也意味着中國文學邁上一個新高度。著名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形容，「在山東高密出生的一個窮農村小孩兒，能夠站到世界的殿堂，這就是中國夢最生動的表现。」他指出，莫言的自信來源於開放，當前內地已成為全球華語文學的中心，未來中國亦需在跨文化的傳播中注入寬度和彈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高麗丹、田一涵、凱雷 北京報道

張頤武 全球華語文心 還看神州周在龍



張頤武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本報記者攝

正如瑞典文學院所言，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美國作家福克納和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而魔幻現實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大背景就是改革開放後，在文化領域，文學家和藝術家們告別教條主義，如飢似渴地走自己的創新之路。

中國文學「能見度」漸提高

莫言作品在國際上的成功，當然也離不開中國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張頤武表示，在過去，尤其80年代之



張頤武獲聘廣州亞運會開幕式藝術指導，由時任廣州市副市長（現任廣東省副省長）許瑞生頒發聘書。

前，中國的文學傳播存在很大的問題，如翻譯語言風格老舊，沒有國際傳播影響力，除了一些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之外，沒有人了解中國文學。「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社會環境的變化，都使得中國文學在社會上的能見度不斷提高。」

強大的寫作韌性、鮮明的文化特色、對西方文化的魔幻現實主義充分掌握、善於演講，當莫言集以上特點於一身時，他也就找到了讀者的最大公約數，「這是莫言小說最妙的地方」。張頤武認為，莫言的作品既能被中國主流社會認可，又能被西方主流純文學界認可，在這樣的基礎上，獲獎自然水到渠成。

莫言雖深受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但他並不盲從，而是注重中國特色和文化內涵，發展出自己的文風。張頤武表示，莫言小說奇妙的地方在於，他在高密的生活充滿了農村的神秘感，山東作家蒲松齡穿越神鬼的作品，對莫言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山東高密的生活很艱難，人們擁有民間的生存智慧，當這些元素與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產生碰撞時，就成為了莫言作品的支點。「他不是模仿馬爾克斯，而是受啟發後，挖掘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獨特的價值觀以及獨特的人性。」

當莫言的作品在書店裡從角落位置賣到脫銷，很多人以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純文學的復興指日可待。然而，事實上中國整個社會對純文學並不是很了解，「中國的純文學一直在萎縮。」張頤武神

情凝重，但他同時指出，萎縮的並非數量而是影響力。

海外華文作家紛遷居內地

張頤武指出，很多80後、90後並不太熟悉莫言的文學作品，其實在獲獎之前，莫言就曾摘得中國「茅盾文學獎」，這也是中國文學界的最高獎項，「被中國主流社會和西方的主流文學界同時肯定，這相當難得。」張頤武強調，「這次莫言的成功，年輕一代和純文學相交的概率就提高了。莫言得獎將會使內地純文學領域更加活躍。」近年來，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的程度已日漸深入，中國作品也更普遍的被翻譯，這些無不得益於中國地位的轉變和中國文學影響力的提升。張頤武歷數創作《金陵十三釵》的嚴歌苓及《飢餓的女兒》作者虹影等海外華文作家，如今皆告別海外轉而選擇中國內地，「這源於內地已成為全球華語文學的中心，未來全球華語文學向中心靠攏的趨勢將日趨明顯。」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評論家張頤武

教授答問

莫言獲獎 提升華語文學地位

記者：您認為莫言小說最好的是哪一部？

張頤武：《生死疲勞》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講的是六道輪迴，是佛家觀點。故事梗概是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變成了一隻豬，又變成一隻狗，用動物的眼光來看世界。這種想法很鮮明，很容易理解，把中國的歷史也串了起來，動物的感受跟人的感受不一樣，這樣寫西方人也能看得懂，中國人也能感受到。

記者：您認為莫言作品獲獎在世界範圍內會產生什麼影響？

張頤武：中國純文學界和世界純文學界實際上是接軌的。過去我們並沒有在世界裡邊，所以要走向世界。但現在已經在世界之中了，所以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純文學就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在跨文化傳播方面，中國文學具有的傳播力是很大的，諾貝爾獎不僅受到西方文學界的矚目，甚至整個西方社會都極其關注。莫言此次獲獎對提升中國文學的地位，提升內地文學在華語文學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西方主流 都接受莫言

記者：有輿論認為，莫言不符合西方文學獎的傳統期待，您怎麼看？

張頤武：傳統期待都是講給中國的和中國主流社會有衝突的人，而莫言是中國主流社會和西方都接受的人。在今天這個時候，莫言也沒有做出跟誰決絕或是對立的表態，他還特別提到了改革開放，提到中國發展對他的影響，也提到他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恩師徐懷中，這就說明，他對中國主流社會還是認可的，他對於西方文學的影響也是肯定的。他的成功說明真正的文學大家都能欣賞。



莫言榮獲諾獎，提升華語文學的世界地位。

文化自信 利跨文化傳播

莫言獲獎，不僅是諾獎評委會對莫言成就的肯定，亦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成就的肯定。「文學的『不可譯性』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大難題，但莫言作品不太有這樣的問題，因為莫言對中國文化的展現特別鮮明但又不複雜，如《紅高粱》裡意象鮮明的紅高粱、《生死疲勞》裡的佛教的六道輪迴。這些文化的符號都很鮮明，一看就是中國的；同時又不複雜，能被外國人理解和接受。」但張頤武指出，跨文化傳播仍任重道遠。莫言給中國作家的啟示是，一個作家要「走出去」，需連續有代表性的作品推出；作品本身既要有個人化的藝術風格，又要有民族化的底蘊，還應有世界性的表達。

獨特人性 獲最廣泛共鳴

莫言站在諾貝爾講台上，用講故事的方式，表達了他對自我、人生、社會、歷史的理解，有人說，莫言之所以能在一群中外著名作家中脫穎而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會講故事，他把具有鮮明民族性的「高密東北鄉」的故事講到了世界上。「莫言講了母親、故鄉，講了想像力和人性。他有對於生命的大關懷，對寫作的大關懷，講到了他和中國發展的不可分

的關係。」張頤武說，這篇演講保持了莫言的個性，尤其是最後的三個故事，是他最清晰的立場陳述，也是他世界觀的最好體現。對於莫言在諾貝爾講台上講的故事，有人讚莫言能引起聽眾對人性的反思，也有人批評莫言「缺乏深度」，張頤武認為，莫言故事的表现力很強，表達對文化的尊重，對血脈的尊重，講得非常自如，足以代表中國本土作家對世界的理解。莫言曾以蒲松齡的後人而自豪，張頤武認為，蒲松齡及山東民間文化跟莫言小說的神秘主義確實很接近，莫言正是通過這些發掘了本土文化的力量。正如莫言所說，「我的作品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方水土上獨特的文化和民俗風情，而且我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超越了地區、種族的隔閡，我的作品是世界的。」



莫言作品同受中西方主流社會認可。

教授著述豐碩 受父影響深遠

以涉獵廣泛、評論老辣和語言詼諧著稱的張頤武喜歡就各種新興的文化現象發言，並始終專注於研究全球化和市場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文化和文學，翻開張頤武的簡歷，入目的是長長的學術論文和專著目錄，而就在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時，張頤武又在北京首發了新著《全球華語小說大系（十卷本）》，這不僅是張頤武的夙願，更是对新世紀中國文學的全景式掃描。「很多搞經典文化研究的學人，不屑於接觸大眾文化。而我始終是兩條腿走路，多年來，我的研究的方向是大眾文化和純文學並重。」張頤武說，當前，內地、港台及海外華文文化在框架上已日漸融為一體，雖有很

多複雜和微妙的碰撞，但大趨勢仍是融合。「我的研究目的是要將華文文化的全球性充分展示出來。」

父親治學嚴謹受益終身

新著問世，張頤武談及此時毫不掩飾父親對自己的影響，「大學校園中濃厚的學術氛圍以及父親嚴謹的治學態度，對我日後所從事的事業研究工作影響深遠。」

張頤武的父親張公瑾是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教授，張公瑾曾先後就讀於東吳大學和復旦大學社會系，1951年到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學習民族語文，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字

系教授，在傣族語言文字研究上有很高的學術造詣。「那個時候，父親為了更好地研究傣語，曾長期在雲南省傣族同胞的聚居區生活，與當地居民同吃同住。在經歷了這樣一段生活之後，父親對傣語能說能用，在認識上有了明顯提高，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深厚基礎。」這也讓張頤武意識到，做學問就要扎實，要熬得住，「物以稀為貴，現在學術界缺少少數民族語言類的專業人才，所以相對而言更容易出成果。但從事這一專業必須要熬得住，耐得住寂寞。」



莫言作品以家鄉高粱地為背景，打響名堂。